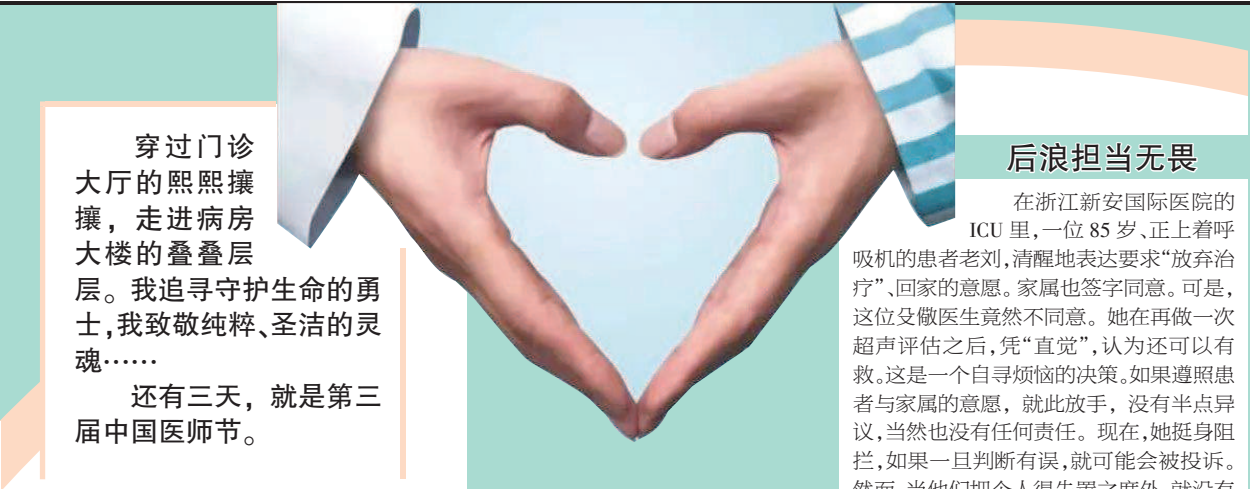




穿过门诊大厅的熙熙攘攘，走进病房大楼的叠叠层层。我追寻守护生命的勇士，我致敬纯粹、圣洁的灵魂……

还有三天，就是第三届中国医师节。

上海医师协会把创办全国第一个医学人文朗诵音乐会的制作任务交给了我。近两年来，各地五百多位医学工作者的倾诉，给予我一个清朗的全新认知。医者的救死扶伤、奋不顾身，决非仅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战场，而是司空见惯的日常。

不是吗？哪家医院不是天天都有救护车呼啸而进……

前辈视死如归

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神医，但是中国有一大批敢于攻坚克难、并为此百折不挠、奋不顾身的好医生。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外科主任顾玉东，首创的足趾游离再造拇指技术，成功率早在1981年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三，为世界领先。但是余下百分之七的“七”，就像一弯尖钩扎在他心上，寝食难安。

一位工伤折断拇指的19岁女青工，慕名由母亲从大连护送到上海。然而，顾医生术中发现这位姑娘的足背动脉变异、血管变细。以往曾有类似症状，成功率很低。手术室里，疑难的气氛凝重；手术室外，母亲要求手术继续的态度坚决，这是母女最后的希望。

奇迹没有发生。用足趾新造的拇指血供很差，手术后指体从红色渐变苍白，最后发黑，尽管母女诚恳接受这个令人遗憾的后果，但顾医生无法原谅自己。他说：“医生职业成果的评估是不能拿百分比来衡量的，即使百分之九十九成功，那个百分之一的失败，对患者个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在手外科，谁都知道，顾医生没有下班时间，也没有节假日。整整五年的日日夜夜，终于攻克了足背动脉变异的难题。他首创的“第二套供血系统”，保证足趾移植后供血万无一失，手术成功率达到了百分之百。1987年，此项医学创新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大奖；1994年，顾玉东先生成为中国工程院首批当之无愧的院士。

汤钊猷院士原来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位血管外科专家。当中国肝癌患者骤然增加，他毅然“半途而废”，改行肝癌专科。他深入肝癌多发地区实地采样、研究，不幸感染乙肝病毒，却依然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岗位，矢志不渝。现在他是肿瘤外科学专家、中国小肝癌研究学科奠基人。

“中国肝胆之父”吴孟超医生，只收“治不好”的病人。从医77年，治愈患者16000多名，96岁高龄还在手术室“治病救人”。为切除一个重达18公斤瘤子，他连续工作12个小时。有一次，吴医生完成一个大手术之后，疲惫不堪地靠在椅子上，两只胳膊撑在座椅的左右两个扶手，汗水湿透了手术衣。他对护士长说：“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倒下去，记住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护士长含泪微微点头。郑州铁路中心医院的妇产科医生胡佩兰，70岁退休之后，到职工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续工作，一周出诊6天，连续20年。98岁逝世之前，她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病人看完了，回家吧！”

——我们的医生，为了“治病救人”，就是这样“视死如归”，而且不愿意让患者看见他们如此这般的付出，以求患者心安。

前辈用生命代价培育的崇高医德，正由“后浪”当代中青年医学工作者光荣传承。

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写在第三届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

◆ 烁 渊



后浪担当无畏

在浙江新安国际医院的ICU里，一位85岁、正上着呼吸机的患者老刘，清醒地表达要求“放弃治疗”、回家的意愿。家属也签字同意。可是，这位受敬医生竟然不同意。她在再做一次超声评估之后，凭“直觉”，认为还可以有救。这是一个自寻烦恼的决策。如果遵照患者与家属的意愿，就此放手，没有半点异议，当然也没有任何责任。现在，她挺身阻拦，如果一旦判断有误，就可能被投诉。然而，当他们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患者的生命至高无上。只要尚存一丝希望，就决不放弃。这就是医者心里的“圣洁”。

受医生费尽口舌与家属30分钟长谈以后，终于获准她继续“抢救”。半个月以后，老刘身上的所有管子都拔掉了，转到了普通病房。两个月以后，老刘回家过年了。他也许不会记得这位受医生，用过很多镇痛、镇静药物之后，会产生“顺性遗忘”。而我们医生的救治本来也就不图什么名利，冒着可能身败名裂的风险仅仅是因为救死扶伤的职责所在。这样的境界在我看来值得敬佩，而医者自己却认为很平常。是啊，习以为常，职业成性。他们是一群纯粹的人。

海阔胸怀扬威

今年1月22日，武汉封城前一天，一位来自迪拜的不速之客，走进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她不是来做核酸检测的，说是来谢恩、感谢救命之恩。

2014年10月，迪拜的这位菲律宾姑娘Hosanna Macaraeg（中文名“麦迪”），突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印度做了骨髓移植、化疗，惨遭失败。21岁的姑娘，危在旦夕。她在家哭喊着“我不要死，我要活”。

麦迪的父亲向全球医学机构发出一百多封电邮呼救。漫长的等待之后，欧美一家医学机构来信表示愿意收治，只是需要预付二十多万美元。工薪阶层，根本无力支付。

2015年12月，麦迪飞到中国，住进了这家同济医院，是血液科主任周剑峰医生接受了她的。

这是一个生还希望十分渺茫的患者，而且涉外，如果救治失败，还会影响国际声誉。倒不完全是因为“艺高胆大”。周医生和他的团队曾成功救治了好几百例各种白血病的危重患者，名声在外，更是使命在肩。他们把“救死”当作天职，无论患者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然而，救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每个患者千差万别，风险如潜伏大海深处的暗礁防不胜防。麦迪在救治过程中，一度高烧持续不退。紧急医学评估显示，姑娘存活几率只千分之一。医护日夜陪伴，寸步不离。危急中，周剑峰医生剑走偏锋、奋力一搏，终于把麦迪从死神魔爪中夺了回来。

出院那天，麦迪的父母、弟弟全家到武汉再三拜谢，盛赞中国医生伟大。其实，麦迪来武汉之前，她父亲咨询过印度的医院，得到的回答是：“中国这家医院很好，可以去一试。”麦迪是带着国际医学界的信任而来，而信任是力量。周医生说他的最大心愿是给绝望者以希望，给患者一个信任的理由。大海无边际，医学无国界。我们中国的医生都有人类的大情怀。



绽放人道朝晖

成都市计划生育指导所所长黄萍医生说，有一种救死扶伤之伤，为精神、心灵的重创，需要医者的现场体验、感受才能发现。

汶川大地震以后，千军万马集中在重建公路、重建校园、重建住宅等家园重建。然而，这些工程并不能完全消除当地百姓的后顾之忧。数千幸存的乡亲顷刻之间丧子、丧女，可能就此断根。这种精神、心灵创伤绝不仅仅是重建公路、住宅可以弥合。就在参与抗震救灾的现场，黄萍医生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专家毛萌及胡丽娜医生等一起，提出了一个别样口号：“生命重建”。

黄萍她们花了足足四年时间，翻山越岭走访1100多个山村，总里程绕地球一圈半，去每家每户了解生育能力。对于那些已失去或将要失去生育能力的夫妇，给予心理抚慰；并采用试管婴儿等多种方式尽力帮助续人香火。

这样的善举，并非是灾民“求医”所为，而是我们的医生主动“送医”上门。准确地说，是登门送子孙啊，功德无量，绽放人道的朝晖。至今，汶川地区已有3654个受灾家庭有了新生儿，山村升起了明日的晨曦。

在崎岖的山路徒步行走千村万家，过度劳累，他们都病倒了；黄萍与毛萌还查出身患癌症。既来之，则安之，医生都是明白人。她们没有多少沮丧，心里满是自豪。三千多个绝处逢“生”的孩子，都称她们为“妈妈”。她们是世界上孩子最多、最光荣的母亲。

致敬医护人员

也是在武汉的同济医院里，看到心脏大血管外科医生郑智写给女儿笑笑的一份“保证书”，很好奇。

笑笑看了《爸爸去哪儿》的电视节目，老是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其实爸爸工作的病区，与笑笑所在医院自办的幼儿园距离只有300米。然而，这300米很遥远。笑笑从小班到大班三年时间里，爸爸从未接送过一次。

有一天，笑笑突然呕吐不止，幼儿园老师急电，请家长马上过来。一个多小时以后，笑笑的妈妈才从单位赶到幼儿园。300米之外的郑医生正在手术，无法脱身。

还有一次，晚上10点多钟，笑笑发烧，也是妈妈抱着赶到医院急诊。那天，郑医生为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宝宝手术。晚上小宝宝也发烧了，郑医生留在病房观察，不能陪伴自己发烧的宝宝。

想起这些，郑医生眼圈发红，泪珠含眶。他在写给女儿的“保证书”里，检讨自己当父亲的失职，并表示一定要在笑笑18岁成人之前，抽一点时间好好陪她。这个时候，笑笑已经10岁了。当这位父亲听说女儿长大以后要当护士，欣慰地笑了，含着泪笑了。

爸爸去哪儿了，妈妈去哪儿了，医生们去哪儿了。在医院，在病房，在驰援的远方，在奋不顾身救死扶伤的手术室、病床旁。

四川彭州的年轻医生贺仕伟说，原想学医为了更好地照顾父母，结果，医院里工作太忙，还要经常出差援外，让父母过早成为空巢老人。听起来，真有点心酸。

经常在上海电视上出现的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党委书记、医学专家卢洪洲，也曾经出生入死。前些年，非洲出现埃博拉病毒肆虐，他报名远征。这个病毒很可怕，被传染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二十。国家给每位驰援的医护人员买了一份高额保险。临行前，卢医生与夫人电话告别，告诉她如果万一被感染，回不来，他的保险金就用来为女儿出嫁买嫁妆。夫人告诉卢医生，他的行李箱里有4件衬衫，每件袖口上都绣有卢洪洲英文名的打头字母“Lhz”。万一他遇不测，夫人可以找到他，领他回家。这样的话别，是那么令人心碎。

还有什么比生离死别更痛苦。我们的医生必须经受，我们医生的家属也只能接受。

所以，我们不仅要尊重、赞美医生，也要关爱、呵护医生的家属。他们那一份默默无闻、也是极其艰难的支持与奉献，我们一般都看不到。

疫情终要过去。我多么希望，非常时期万众心上喷薄的那份对医学工作者的敬重与护佑、感恩与仰慕，成为一种常态。事过境迁不改变，要像“尊师重教”那样“尊医重护”。只有当医生成为大家共同的好朋友，我们的社会才安康。

善待医护工作者，就是善待我们自己。